

# 有罪推定式的「文學批評」

● 趙毅衡

跟「文學批評」打交道已近25年，我明白，在這個「學科」中，任何論辯都可以言之成理，在文學作品中，要找任何根據，全能找到；字裏行間找不到，還可以在「文本空白處」尋覓。所以，只要文章寫得吸引人，觀點新穎，大可不必為是非對錯傷腦筋。弄文學的都知道法郎士 (Anatole France) 一個世紀前的名言：「批評家應當老實坦白：關於莎士比亞，關於拉辛，我談的就是我自己」<sup>①</sup>。經過一個世紀的理論爆炸學科建設，文學批評看來又回到法郎士的妙論。

然而不要忘記，法郎士還有半句在前：文學批評是「靈魂在作品中冒險」<sup>②</sup>。這是文學評論的底線：如果不涉及作品，靈魂冒險記下來，叫甚麼都可以，總不能叫文學批評吧。

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，評家措手不及。他的作品，除了某些法文譯本，發行數都極有限。他在英語世界長期受的冷遇，遠遠超過其他主要語種。從去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，大部分評者之言，只是新聞界逼出來的無可奈何應景話。無怪乎對《二十一世紀》12月高行健專號，中文讀書界翹首以待。一是學術刊物，當然不會只是表態性文字；二是集稿時間已是11月下旬，願意評論的人，早就能讀到高的近作。除了舊版新版，許多網

站，包括大陸網站，刊發了高行健幾乎全部劇作，甚至長篇全文。

不出所料，《二十一世紀》這期的有關文字，大都是仔細閱讀之後寫成的。無論褒貶，都有所根據。從這一專輯起，加上《世紀中國》網上一些較短篇什，高行健獲諾貝爾獎激起的反應，終於不再是徒托空言。各種已經被提出來的問題，例如作品是否夠格，給獎是否判斷有誤，是否有政治考慮等等，觀點不妨堅持，評者卻不再說「我沒有讀過，但我認為……」。

於是，評論開始有實質內容起來。湯一介作為宗教哲學家與道教史家，我從未見到他品論文學，聽他評《靈山》，眼光獨到，令人心折；朱大可也評《靈山》，有褒有貶：「卓越努力」，但「虎頭蛇尾」；而葛紅兵評同一書，備極讚揚，「找到漢語寫作的特殊路線」，幾乎同意了瑞典皇家學院那段越俎代庖的評語。

例如高行健究竟何種體裁較強，許紀霖認為戲劇比小說強，李歐梵認為高行健「基本是位劇作家」，我個人亦作如此看，朱大可卻認為小說比戲劇好些，瑞典皇家學院評價雖較高，取捨卻與朱大可相近。

陳曉明評《逃亡》，敏感地看出其中的女學生「漸漸聖母化」，男人卻像大孩子，要安慰。由此，他認為此劇

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，評家措手不及。從去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，大部分評者之言，只是新聞界逼出來的無可奈何應景話。無怪乎對《二十一世紀》12月高行健專號，中文讀書界翹首以待。這期的有關文字，大都是仔細閱讀之後寫成的。無論褒貶，都有所根據。

張旭東〈承認的政治與被承認的期待〉的論點一點不含糊：高行健得獎，是「整個西方價值觀念及其文化生產機器」所做的一個「示範」性動作，按照自己的內在需要製造「他人」。但是他不願返回作品，而是步步推進其結論，這已經遠遠不是一篇文學批評。

「面對絕望的生存困境，……解決方式卻又簡單而幼稚」；楊小濱同意，說此劇「多少有點迂腐」，卻認為「惟其如此才使文學具有了某種間離的效應」，意思是文學只有如此寫法。

至於楊小濱論《對話與反詰》，認為上半齣男女衝突是歷史，下半齣男女成鬼是後歷史，因為失去了反思理性，「歷史變得不可拯救，不可『揚棄』」。而整個劇與《絕對信號》火車式單向歷史觀正成對比，構成元歷史研究的妙例。這個非常「法蘭克福」的讀法，令人拍案稱絕。

整個專輯只有一篇，即張旭東〈承認的政治與被承認的期待〉，聲明「談的只是『獲獎事件』，高行健的作品如何不在討論範圍之內」。

但是張旭東的論點卻一點不含糊：高行健得獎，是「整個西方價值觀念及其文化生產機器」所做的一個「示範」性動作，按照自己的內在需要製造「他人」，「而高行健作為諾貝爾獎獲得者，就是這樣一種（西方）自我世界內部的『他人』的影子」。

張旭東似乎是說：「他人」雖然是非我的一切，「影子他人」卻具有一切可接受性，製造出來，就可以抵銷「他人」的威脅，起驅魔作用。這個說法，不能說沒有新意。如果張旭東能在高行健的小說戲劇中抽選一些例子（應當不難吧），或許能言之成理，說不定能把現代批評理論推進一步。

但是他不願返回作品，而是步步推進其結論：「形形色色、不計其數的西方文學獎、電影獎、學術獎，在總體上形成了一部嚴絲合縫的意識形態機器」。再進一步，給高行健諾貝爾獎，足以給「痛苦搖擺」的「美國對華政策」一點啟示：「拿中國頭疼的西方的唯一選擇」，是如法炮製「影子他人」。

說到此，已經遠遠不是一篇文學批評。世界難題，已經舉重若輕地解

決。這還不夠，還找出理論名家支持。名家不是別人，是那位反猶、支持納粹、作過戈林 (Hermann W. Göring) 顧問的政治學者施米特 (Carl Schmitt) ③。誠然，以人廢言大可不必，但是施米特和曾經與法西斯合作的散文家周作人、小說家賽里納 (Louis Ferdinand Celine)、詩人龐德 (Ezra Pound)、哲學家海德格爾 (Martin Heidegger) 不同，政治學是他的專業領域，他從右的方向對魏瑪共和國的批判，為納粹主義直接提供了理論支持。

施米特最近在美國學界大行其道，因為他對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，揭露深刻，剖析犀利。歐洲學界，畢竟創重難忘，對此就比較謹慎，知道這個學術遊戲不無危險。哈貝馬斯 (Jürgen Habermas) 認為施米特落在尼采投向二十世紀政治學的影子中④。反對瑞典皇家學院這次頒獎的瑞典新左派，翻譯了張旭東這篇文章，卻明智地略去了所有來自施米特的論點⑤。在討論高行健時，李歐梵指出歐洲與美國文化取向日益不同，的確是很敏感的觀察。「西方意識形態機器」，似乎遠非「嚴絲合縫」。

拿施米特「民主首先關心同質」的高論來討論高行健，結果如何？敵人找出來了，左右也同調了。魏瑪共和國在左右夾攻中失敗，引出二十世紀最大慘事，難道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政治中，會重複這個悲劇？

我真不願意說這些與文學無關的話，這題目是張旭東強加給我們的。記得在網上看到張旭東此文，題為〈在賽珍珠與索爾仁尼琴之間〉。說賽珍珠，是說作品不夠格（儘管張旭東承認自己沒有讀作品）；說索爾仁尼琴，是說諾貝爾獎又捲入了勃列日涅夫—尼克松式的冷戰。須知，現在尚無冷戰，我們大家都不想看到這種局面。要說存在「中西文化衝突」，或

許有點道理，但是這個衝突已經有150年歷史，對此問題中國知識份子早已經擺脫簡單化的態度。一定要說諾貝爾獎不過是施米特說的「民主政治在清除異己」，任何得獎作品就都成了「一個無足輕重的符號」，越得獎就越不值得一讀。文章到此，真讓人冷汗不止。

所以請允許我轉個題目。

現在錢鍾書先生受某些人譏議，認為他沒有思想立場。將來錢先生的全部筆記發表時，想必可以看出遠非如此。1983年，在一個場合又見到先生，說起當時剛受注意的薩伊德(Edward Said)《東方主義》。「薩伊德之於阿拉法特，就如馬爾羅之於戴高樂」。先生亮出談鋒，讓我們一楞。「西方人寫到東方，說壞話，是『東方主義』；說好話，也是『東方主義』」。說完，當然是莫測高深的錢式微笑。

錢先生片語，對我實如醍醐灌頂，廓清重霧。我知道先生能如此直點命穴，不僅是對國際文化政治的超人敏感，他的碩士論文〈英國十七十八世紀文學中的中國〉，至今是這個領域中的典範之作。不過薩伊德也是從作品出發，從埃斯庫盧斯(Aeschylus)一直仔細讀到普魯斯特(Marcel Proust)，此書成為當代批評理論里程碑式經典，並非浪得虛名。

所以我這次讀到朱大可文中的類似觀點，欣然同意：「在陰謀論者看來」，中國人得獎，也是西方陰謀；中國人不得獎，也是西方陰謀。審判者永遠享有道義優越感。

因此，同一個意思，可以做兩邊題目，不過文字卻得寫成兩篇。得獎陰謀論，必得說高行健作品不好；不得獎陰謀論，必須說高行健作品好。本來高行健就不是篇篇完美，但也不是從無佳作，所以甚麼文章都做得，

張旭東的「影子他人」文章也做得。

然而，張旭東卻並不如此。他認為完全不必「討論作品如何」可以一乾二脆地討論「事件」，因此評論獲獎或不獲獎，可以用同一理論。實際上，由於與作品本身無關，所以任何作品已得到(或是將得到)西方的獎——哈金得美國國家圖書獎，程抱一得法國Prix Femina獎，或是張藝謀、陳凱歌、王家衛得電影獎，或是張旭東本人得學術獎(憑張旭東的學識和美國學界傾向，完全有可能)——都一律不必看作品。只要與西方的獎有關，眼前這篇文章就已經作好裁定。

這不是文學批評，也不是文化批評，甚至不是文學的政治式批評。這是「有罪推定」的預訂宣判書。

張旭東認為完全不必「討論作品如何」可以一乾二脆地討論「事件」，因此評論獲獎或不獲獎，可以用同一理論。這不是文學批評，也不是文化批評，甚至不是文學的政治式批評。只要與西方的獎有關，眼前這篇文章就已經作好裁定。這是「有罪推定」的預訂宣判書。

#### 註釋

①② 轉引自William K Wimsatt et al., *Literary Criticism: A Short History* (New York: Knopf, 1957), 495; 495.

③ 關於施米特的評價，可以參考Gopal Balakrishnan對施米特評價甚高的近作*The Enemy: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of Carl Schmitt* (London: Verso, 2000)。阿倫特在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中數次指責施米特，但是也說了公平話。該書臨近結尾有長註，說施米特思想複雜得超出納粹黨需要，所以在30年代中期，他在納粹集團內的地位被更馴順的理論家取代。Hannah Arendt, *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* (New York: Harcourt, 1957), 339 n65.

④ Jürgen Habermas, *Legitimation Crisis*, trans. Thomas McCarthy (Cambridge: Polity, 1988), 122.

⑤ 據陳邁平介紹，此瑞典文本刊於瑞典《每日新聞》12月8日。

趙毅衡 現執教於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